

华北农户借债用途的结构与变迁^{*}

——基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考察（1930-1998）

赵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保存的1930年到1998年无锡保定农村系列调查资料，分析以保定农户为代表的华北农户借债用途的结构及其变迁。作者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20世纪末的70年中，保定农户随着经济处境的变迁，其借债用途的变化趋势表现为由非生产性借债为主转向以生产性借债为主。制约农户融资的最根本约束因素是农户的信用抵押担保。

[关键词] 农户 借债用途 农村调查

农户借债用途不仅反映出农户的融资需求，其结构的变迁还反映出农户经济处境的变化。笔者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其前身与协作单位从1929年到1998年对无锡、保定农村持续进行的4次系列调查，分析华北农户借债用途的结构与变迁。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理论分析框架，第三到第五部分分析1930年到1998年农户借债用途的结构与变迁，第六部分是简短的结论。笔者认为，从1930年到1998年近70年中，农户借债用途发生了由非生产性借债为主转向生产性借债为主的颠覆性的变迁；农户借债用途结构的变迁，反映了农户自身经济环境的变迁；农户融资的最根本的约束因素是农户信用抵押担保的不足。

一、引言

如何处理破解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是近些年来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农户融资难，反映出农户融资需求受到制约。寻找农户融资难的解决方案时，需要明白以下问题：第一，农户的融资需求是什么？第二，农户融资需求是否已发生变化？第三，制约农户融资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第四，应该在哪些方面增加借贷资金的供给？因此，研究农户融资问题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研究农户融资需求的变化。通常农户融资需求从其融资意愿中反映出来，而对于历史上农户的融资需求，如果没有相关的调查研究资料，我们很难找到答案。

不过，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进行思考。由于借债用途是融资需求的最终反映，因此，可以从借债用途反观农户的融资需求。这样，通过分析农户借债用途的变迁就可以研究农户融资需求的变迁问题。

目前中国农户依然带有传统小农的浓厚色彩。传统小农将借债用于日常生活及生产的方方面面，大体可分为生活性借贷用途、生产性借贷用途及其他三大类。由此推之，农户融资需求也可分为生活性借贷需求、生产性借贷需求及其他三大类。

^{*} 本文是笔者任首席研究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近百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经济的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中国小农的借债用途，学界前辈曾作过不少调查。如，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李景汉、卜凯等人在调查中国农村经济时将农户借贷作为调查的主要内容，当代学者李金铮、徐畅等根据卜凯等人的调查资料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许多地方的人民政府对农家经济做过详细调查，常明明等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撰写了农村借贷问题的论著。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户已不是传统的小农，对农户借贷问题的调查文献非常少见。改革开放后到 2000 年之前，随着中国农户重归传统意义上的小农，农户借贷迅猛兴起，不少研究机构、学者开始关注农户借贷问题，对农户借债情况的调查也多了起来，如邓英淘、张元红、何广文、曹力群等人，都通过不同区域农户借贷的实地调查来研究农户的借贷问题。2000 年后，研究农户借贷更是蔚然成风，本文不再赘述。

上述调查资料及研究论著，展现了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农户借债用途的不同结构。如果我们简单地按时序排列下来，可以看到农户借债用途的时代变迁。但是，因为这些文献反映的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情况，逻辑并不一致，所得结论有可能出现偏差。实际上，因调查区域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即使同一时期都做农户借贷调查，学者们的观点也可能相左。比如，当代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户的借贷需求是以生活性为主，还是以生产性为主时，就有迥异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是以生活性借贷为主，也有学者认为是以生产性借贷为主，还有学者认为生活性借贷与生产性借贷并重。¹这表明，由于中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极大，试图得出全国农户借债用途结构的变迁是比较困难的。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利用 1930-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系列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作为个案，进行尝试性的研究。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对同一地区的特定农户持续进行 80 余年的系列调查，积累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该系列调查始于 1929 年，在陈翰笙先生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对无锡、保定两地 1700 余户农户作了第一次调查。1958 年，在孙冶方、薛暮桥领导下，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前身）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对无锡、保定地区 22 村 3000 余户农户作了第二次调查。1988 年，在王岐山、董辅初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合作，对无锡、保定地区 22 村 2000 余户农户作了第三次调查。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与荷兰教育部合作，对无锡、保定地区 22 村近 3000 户农户作了第四次调查。本文试图利用这一系列调查资料保定地区的相关资料，考察 1930-1998 年华北农户借债用途结构的变迁。

二、农户融资需求与用途的理论分析架构

1. 小农行为理论

小农借债动机是研究农户借贷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借债是农户的经济行为，因此，考察农户借债动机又需要弄清农户的经济处境。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户经济行为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理论假说：即“理性小农”、“生存伦理小农”与“拐杖小农”。²

W.舒尔茨(Schultz)、S.波普金(Popkin)提出了“舒尔茨—波普金理性小农命题”。舒尔茨坚信农户是“理性小农”，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都毫不逊色，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波普金认为

¹何广文、李莉莉：《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年；杨玉萍、王茵、李鹏：《村户资金借贷状况调查报告》，《新疆农垦经济》，2008 年第 4 期；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课题组：《西北五省区农村金融问卷调查分析报告》，《金融时报》2005-8-2；刘锡良等：《中国转型期农村金融体系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年，《前言》。

²不过，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假说与其说是“小农行为理论”，不如说是“小农经济处境理论”更为贴切。

农户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事。³

不同于舒尔茨对小农行为的描述，恰亚诺夫（Chayanov, A. V.）、斯科特（Scott, J. C.）等人认为农户是“非理性小农”，生存艰辛。恰亚诺夫指出农户的行为方式“迥异于资本主义农场”，他们难以计算成本与收益，其经济行为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满足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均衡，而非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比较。⁴斯科特考察了东南亚农户艰难的生存处境，认为小农的生活就像“一个人长久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小农坚守“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原则，宁可选择次优的生活条件以避免经济灾难，也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⁵

黄宗智分析华北的农户经济后，提出了“拐杖小农”理论。他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华北农户的耕作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过密化”，他们不得不忍受接近于饥饿水平的收入，依靠佣工和商业性手工业这两根“拐杖”才能坚韧生存。⁶

国内学者受上述理论影响，试图将当代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处境对号入座。张杰认为，黄宗智的“拐杖小农”命题更接近于中国农民的状况。⁷刘锡良等人认为，现阶段“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并存，但小农行为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及生活消费的情况下，许多“道义小农”将逐步走向“理性小农”。⁸胡士华提出三种类型的小农都存在，贫困农户类似于“道义小农”命题下的小农，温饱型农户属于“拐杖经济”下的小农，市场开拓型的市场型农户则是“理性小农”。⁹

笔者认为，笼统地以“理性小农”、“道义小农”或“拐杖小农”来概括中国农户的经济处境及经济行为的特征，都会失之过简。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任何时期这三种小农经济处境都是存在的，不过，不同的历史阶段，“道义小农”或“拐杖小农”分别占居了小农经济的主流。另外，不同农户表现出不同的经济行为，其决定因素在于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不同的经济环境。换言之，农户的经济环境决定了农户的经济行为。

2. 农户融资需求与借债用途

农户是我国传统社会基本的生产经营细胞。农户之所以借债，就是为了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暂时的资金短缺问题。中国农户融资需求主要包括：购置土地、购置牲畜及农具、购置农药及肥料、购买种籽、购置工商业设备与原料、支付雇工工资、缴纳捐税、建造及修缮房屋、婚丧嫁娶、购买生活消费品、购买奢侈品、借钱治病、借钱上学、人情往来花费、偿还赌资、归还旧债等等，这些需求大体可分为生产性融资需求、生活性融资需求及其他融资需求，或者可再简单地划分为生产性融资需求与非生产性融资需求。融资需求反映的是农户的借债愿望，不少学者运用合约考察法和意愿调查法来研究农户的借贷需求问题。¹⁰

农户的借债用途就是农户负债的具体使用方向。与意向性的融资需求不同，农户借债用途反映的是已确切发生的事实。不过，农户融资需求与借债用途又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情况下，借债用途体现了融资需求的实现。受历史的局限，我们不可能用合约考察法或意愿调查

³舒尔茨(Schultz, T. W.):《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 年。Popkin, S.,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转引自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金融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⁴ Chayanov, A. V.,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⁵斯科特(Scott, J. C.):《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 年。

⁶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 年；《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 年。

⁷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金融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⁸刘锡良等：《中国转型期农村金融体系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年，第 41-42 页。

⁹胡士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问题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69 页。

¹⁰不过，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等人认为，合约考察法隐含的假设是信贷合约上的贷款用途是真实的贷款用途，意愿调查法认为所有样本农户都有信贷需求，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生产性抑或消费性——方法比较与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7 年第 3 期。

法去考察历史长河中的农户融资需求情况，我们只能从结果反推原因，在分析历史上农户的融资需求时，把借债用途作为反映其融资需求的镜中形象，近似地将借债用途等同于融资需求。农户的借债用途可相应的分为生产性用途、生活性用途及其他用途三个方面，也可以再简单地分为生产性借债用途与非生产性借债用途

农户的经济处境决定其融资需求。如果属于“理性小农”或处于“拐杖小农”境地，农户会为生产而借债；如果属于“道义小农”境地，农户则更可能会为生活而借债。不少学者认为农户在收入水平、发展条件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借贷需求表现出多层次性和多样性特征。¹¹但由于文化传统及其他外在因素的制约，中国各层次农户的融资次序非常相似，具有强烈的“内源融资”偏好，即先为生活融资，再为生产融资；先亲朋圈内融资，再向外融资；先靠民间非正规金融体系融资，再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¹²农户形成三个融资层次：亲友间的自我融资、社区间的互助合作、市场化融资。¹³

近代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迁，农户的社会地位、经济处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应地，农户也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融资需求。¹⁴因此，研究农户融资动机应有一个动态的眼光。

3. 农户融资受到的约束

如果农户的融资需求没有完全得到满足，表明农户面临着融资约束。国外不少学者认为，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信贷交易成本、契约执行能力和意愿等，都会对农户融资产生重要影响。¹⁵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户融资约束问题，认为农户的金融需求除了受自身约束外，还面临着市场约束、信息约束、信贷约束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笔者认为，农户融资约束归根到底是受制于信用担保的约束。而影响农户获得信用担保的主要因素，一是农户家庭的财产与未来收入，二是农户的社会信誉。

三、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农户借债的用途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中国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小农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其经济处境正如斯科特所定义的小农状况，处于“道义小农”境地。但即使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小农依然顽强地寻找出去做雇工的机会及经营小买卖的机会，如黄宗智所定义的“拐杖小农”。

在这种经济处境下，农户更多地将借债用于解决临时生活困难，但也有部分借贷资金用于生产方面。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华北农村相对比较稳定，农户借债投入生产的比例较高。抗日战争爆发后，农户借债用于生产的比例更少得可怜。无锡保定系列农村调查资料就反映了当时农户借债用途的结构。

¹¹冯兴元、何梦笔、何广文：《试论中国农村金融的多元化》，《中国农村观察》2004 年第 5 期；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供求特征及均衡供求的路径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01 年第 10 期；刘锡良等：《中国转型期农村金融体系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年，《前言》及第 104 页；祝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6 月，第 91 页。

¹²张杰提出，中国农户融资的逻辑次序是：首先用非农收入增添家庭流动资金，其次是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最后在迫不得已时诉求于高息借贷。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金融研究》2005 年第 2 期。

¹³刘锡良等人认为农户融资次序依次为：个人通过兼业实现自我融资或保险、亲属间相互捐赠互助、熟人间的民间借贷、联保贷款、社区合作金融、中小金融机构贷款、大商业银行。刘锡良等：《中国转型期农村金融体系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年，第 104-105 页。

¹⁴纪志耿认为，农户的借贷动机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依次经历生存借贷、消费借贷、生产借贷等若干阶段；每一种借贷动机都和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和农户当时的收支状况及经济地位相关联。纪志耿：《农户借贷动机的演进路径研究——基于三大“小农命题”的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7 年第 6 期。

¹⁵张杭辉、俞建拖：《农户融资研究综述》，载刘民权等主编《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410-425 页。

1930 年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时，保定地区共调查 1152 户，其中 164 户发生了借债，占被调查户的 14.2%，户均借债 219.9 元。从当时的调查项目看，农户用于生产方面的借债比例为 17.17%，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占比为 12.06%，用于婚丧喜庆的比例为 6.8%，用于交付捐税债务的比例为 1.86%，用于抽大烟、吃喝、赌博等挥霍性消费及归还旧债的比例高达 62.11%（主要是地主、富农等富裕农户借债消费）。如果简单地将农户借债分为生产性用途与非生产性用途两类，则生产性借贷不足 18%，而用于非生产方面所占比例则超过 82%。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1930-1998 年保定地区农户借债情况

单位：元

调查时间	调查样本数（户）	其中借债户（户）		负债额	户均借债额
		户数	占样本数%		
1930	1152	164	14.2	36066.35	219.9
1936	1208	81	6.7	9177.23	113.1
1946	1403	43	3.1	2628.36	61.1
1957	2138	466	21.8	13993.21	30
1987	464	198	42.7	360953	1823
1997	2010	260	12.9	3802210	14623.9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1930-1957 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综合资料》（油印本），1958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1930-1998）。因调查问卷设计问题，本表农户负债额与表 2 有差异。

表 2 1930-1998 年保定地区农户借债用途

单位：元

年份	借 债 户数	负债金额	生产性借贷	非生产性借贷			
				生活性借贷		其他用途	
			购生产资料	购生活资料	婚丧喜庆	交付捐税债务	其他
1930	164	36066.35	6189.4	4349.07	2429.44	668.57	22429.73
1936	81	9177.23	1030.8	2696.1	1634.33	366.88	3448.52
1946	43	2628.36	48	1436.98	133	228	782.38
1957	466	13993.21	3124.7	6733.37	413		3722.14
1998	260	2555810	2174310	381500			

注：表中“其他”项下，1930、1936、1946、1957 年主要指抽大烟、吃喝、赌博等挥霍性消费及归还旧债。1998 年的调查分为三项，一是用于农业生产，二是用于非农业生产，三是用于生活消费，本表将前两项合并为生产性借贷。1987 年的调查缺乏数据，只得从略。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1930-1957 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综合资料》（油印本），1958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1930-1998）。

表 3 1930-1998 年保定地区农户借债用途结构（%）

年份	负 债 金额	生产性借贷	非生产性借贷			
			生活性借贷		其他	
		购买生产资料	购买生活资料	婚丧喜庆	交付捐税债务	其他
1930	100	17.17	12.06	6.8	1.86	62.11

1936	100	11.23	29.29	17.82	4	37.59
1946	100	1.83	54.67	5.06	8.67	29.77
1957	100	22.34	49.12	2.95		26.59
1998	100	85.07	14.93			

注：表中“其他”项下，1930、1936、1946、1957年主要指抽大烟、赌博等挥霍性消费。1998年的调查分为三项，一是用于农业生产，二是用于非农业生产，三是用于生活消费，本表将前两项合并为生产性借贷。1987年的调查缺乏数据，只得从略。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1930-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综合资料》（油印本），195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库（1930-1998）。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景汉、卜凯等学者开展的中国农村调查，可以印证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中农户借债用途结构的普遍性。李景汉先生1928年在河北省定县调查了6个村，发现有68家农户借债，其中甲村9家借债，平均每家139元，乙村19家借债，平均每家168元，丙村6家借债，平均每家90元，丁村10家借债，平均每家37元，戊村15家借债，平均每家66元，己村90家借债，平均每家107元。68户共借债7296元，平均每户107元。68家农户借债用途分为三类：用于生产方面如买地、经商、买牲畜经、买农具、凿井等方面的有13家，占19.12%；用于非生产方面如被家亏、还旧账、修盖房屋、买粮食、诉讼、路费、抽大烟、赌博、婚丧嫁娶等方面的有53家，占77.94%，用于教育方面的有2家，占2.94%。¹⁶李景汉的调查表明，定县农户借债用于生产方面不足20%，用于非生产方面的借债高达80%以上。

卜凯曾对中国22个省140余县的作过调查，结果表明，农户借债用于生产方面的比例较低，而用于生活等非生产性方面却占绝大部分。见下表4。

表4 1929-1933年长江中下游乡村农户借贷用途

省别	负债户（占总调查户%）			负债额（占当年借额%）		
	生产用途	非生产用途	总计（1）	生产用途	非生产用途	总计
江苏	22	41.1	51.4	21.5	79	100.5
浙江	7.1	34.4	40	20.2	75.2	95.4
安徽	20	32.6	43.2	18.1	65.6	83.7
江西	10.5	40.8	48.7	10.7	41.3	52
湖南	9.3	31.3	36.8	11	40.8	51.8
湖北	15.8	32.8	42.6	18.6	52.8	71.4
6省平均	14.1	35.5	43.8	16.7	59.1	75.8
22省平均	10.7	31.4	36.8	17.6	58.8	76.37

（1）因用于生产和非生产者的负债户的相互重合之处，故二者的百分率大于总计百分率。

转引自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54、55页。

与李景汉、卜凯的调查相参照，保定地区农户借债用途的结构正是全国小农的一个缩影。

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合作进行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时，对1936年、1946年农村经济情况作了回顾性调查。调查表明，1936年保定地区农户借债用于生产的比例仅为11.23%，而用于非生产性方面的比例超过88%。1946年农户借债用于

¹⁶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大学出版社，民国22年出版，第735、736页。

生产方面的比例更低，只有 1.83%，绝大多数用于解决生活困难，这种反常与持续的战争相关。见表 1、表 2、表 3。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农户融资的主渠道是私人借贷，制约农户融资的主要因素是农户能否提供足够的抵押担保。

四、20 世纪 50 年代农户借债的用途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农村经济逐渐走向正轨。百业待兴，中国小农表现出舒尔茨所定义的“理性小农的”特征。农村土地改革后不久，出现了“中农化”及新富农，积极利用各种机会“点石成金”，用于生产方面的借债所占比例明显上升。

据常明明的研究，1952 年鄂、湘、赣、粤 4 省 19 乡 9756 户农户中 1700 户发生借债，所占比例为 17.43%。¹⁷从农户借债用途看，用于非生产性方面所占比例仍然很大，用于生产方面比例依旧较低，但已高于战争时期。如 1953 年湖北省 10 乡 4971 户农户中，借债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占 18.08%，用于生活资料方面占 42.79%，用于婚丧方面占 20.04%，用于治疗占 6.03%，用于修补房屋占 8.89%，用于其他方面占 4.17%。¹⁸

另据 1954 年中国人民银行对河北、吉林、江苏、安徽、河南、广东、贵州 7 省 18 个县、区的 18 村、3435 户农户私人借贷情况的调查，生产性借债所占比例已超过 40%。18 村共有 546 户发生借债，占被调查农户的 15.9%，其中负债农户占被调查农户比例最多的是安徽农村（29.5%），最少的是江苏农村（6.4%），见表 5。从农户借债用途看，生产性借贷比例达到 42.8%，非生产性借贷所占比例则相对下降，为 57.2%。其中，贫农、中农发生的借贷较其他阶级为多。见表 6。

表 5 1954 年河北等 7 省 18 村农户负债情况

地区	被调查村数	被调查户数	借债户	
			户数	占总户数%
河北	2	904	79	8.7
吉林	3	661	69	10.4
江苏	2	105	72	6.9
安徽	5	407	120	29.5
河南	3	255	52	20.4
广东	2	986	135	13.7
贵州	1	117	19	16.3
合计	18	3435	546	15.9

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管理局，1954-永久-6。

表 6 1954 年河北等 7 省 18 村农户借债的用途

成份	借债合计		借债用途				
	金 额：万 元	占合计%	生产用途		非生产用途		
			购生产资料	经商买地	改善生活	生活急需	其他

¹⁷ 常明明：《中国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研究——以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中南区为中心》，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年，第 51 页。

¹⁸ 常明明：《中国农村私人借贷关系研究——以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中南区为中心》，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年，第 187 页。

贫农	15509	63.2	6032	45	2017	6957	458
中农	4769	19.4	2369	100	441	1801	58
富家	532	2.2	421	19		85	7
地主	124	0.5	72			52	
商人	489	2	54	260		115	60
雇农	503	2.1	213			290	
其他	2598	10.6	792	109	370	1044	283
合计	24524	100	9953	533	2828	10344	866
占合计的%	100		40.6	2.2	11.5	42.2	3.5

注:生活急需主要指口粮、疾病、丧葬等;改善生活主要指结婚、盖房、日用。

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管理局, 1954-永久-6。

不过, 1958 年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所反映的保定地区农户生产性借债比例远低于 1954 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比例。这次调查也是对进入集体化之前个体农户家庭经济情况的调查。保定地区 11 村共调查 2138 户, 其中借债户为 466 户, 占调查样本量的 21.8%, 负债总额为 13993.21 元, 户均 30 元。负债中用于生产方面的 3124.7 元, 占总额的 22.34%; 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 6733.37 元, 占总额的 49.12%; 用于婚丧嫁娶 413 元, 占总额的 2.95%; 用于吃喝、赌博、还旧债等方面 3722.14 元; 占总额的 26.59%。见表 1、表 2、表 3。

如果将农户借债用途分为生产性借债与非生产性借债两类, 1957 年保定地区农户生产性借债占 22.34%, 非生产性借债占 77.66%。虽然农户用于生产方面借债的比例低于 1954 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 但与 1930 年、1936 年、1946 年的情况相比, 已有显著增长。

20 世纪 50 年代, 个体农户从国家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得到的贷款仍然较少。农户融资的主渠道仍然是私人借贷, 农户能够借到多少资金, 仍决定于其家庭的财产状况及能够得到多大的担保。

五、改革开放后农户借债用途的变化

1958 年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 单个农户成为农村集体经济中的一分子, 他们不再自主组织生产, 也就不必再为生产活动融资。因此, 在人民公社时期, 农户借债的用途比较单一, 基本上用于非生产性方面, 如购买生活消费品、婚丧嫁娶、修建房屋、治病等等。

改革开放后,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 农户重新回归自我经营的小农经济轨道, 生产、投资、融资、销售等等各个环节都需要自己解决。特别是政府放活农村经济后,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地位相差无几的农户出现分化, 一部分人开始投身于工商业, 生产性借贷需求如雨后春笋, 在农户借债中所占比例步步升高。笔者将 1984 年到 2000 年发表的有关农户借债情况调查文献中借债用途的结构整理出来, 列表 7, 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农户投入生产方面借债的比例。因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同, 不同地区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但总体上看, 生产性借债所占比例上升了。

表 7 20 世纪 80、90 年代农户借贷用途的结构

单位: %

调查时间	调查地区	调查户数	生产性借债	非生产性借债					
				合计	生活消	修建房	婚丧	治	其

					费	屋	嫁娶	病	他
1984	广西贵县	43	6 1.76 (1) 3 8.23 (2)	57	2 9.4 1				
1987	四川遂宁	103	34.45	66.55					
1987	湖北	918	27	73		24. 82	48.18		
1988	贵州遵义	200	43.74	56.26					
1989	内蒙阿荣旗		85	15	8		5		3
1990	吉林榆树县		31.8	68.2	9.4	25.6	24.7	7.6	
1991	河南固始、淮滨、息县、潢川灾区	895	35	65	51		5	7	2
1992	15省		47	53	11 (3)	29	13		
1992	江西南漳县	120	31	69					
1993	河南漯河		95	5					
1998	浙江、江苏、河北、河南、陕西 21 县	365	32	68	11.8	20.5	7.45	28.88	
1998	广东东莞、浙江温州、湖北汉川、山西原平、陕西商州	256	42.9	57.1					

注：原调查中(1)为生产投资，(2)为用于商业流通，(3)包括除建房、婚丧嫁娶外的其他消费；表中空缺项不详。

本表资料来源：陆万春：《农村民间借贷问题的调查与探索》，《中国农业会计》1991年第4期；邓英淘、刘建进、张一民：《中国农村的民间借贷》，《战略与管理》1993年第11期；聂世富、罗彤等：《民间借贷弊多利少——农民家计户调查》，《金融研究》1987年第10期；何云丰：《遂宁市一百户民间借贷调查》，《四川金融》1988年第3期；内蒙古呼盟人民银行调研室、阿荣旗支行：《对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民间借贷调查》，《农村金融研究》1989年第2期；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南漳县支行联合调查组：《民间借贷日趋活跃，弊多利少急待引导——对南漳县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的调查与思考》，《银行与企业》1992年第5期；黄金木、王社教：《对漯河市民间借贷状况调查与思考》，《金融理论与实践》1993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金融研究课题组：《农民金融需求及金融服务供给》，《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7期；张艳峰：《对河南灾区农村民间借贷情况的调查》，《金融理论与实践》1992年第6期；李承中：《对遵义地区农村资金市场的调查与思考》，《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7期；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0期；玉林中支、贵县支行、覃塘所联合调查组：《关于覃塘圩镇民间信用的调查报告》，《广西农村金融研究》1984年第11期。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对无锡保定22村1987年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第三次调查。此次调查的资料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撤并受到损失，已残缺不全，录入数据库只有746个样本。保定地区的调查资料存有464个样本户，其中有198户发生借债，负债户占样本户的比例为42.7%，借债总额为360953元，户均1823元。见表1。非常遗憾的是，这次调查没有农户借债用途的数据。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无锡保定22村进行第四次经济调查。保定地区被调查农户为2010户，其中有260户发生借债，占被调查户的12.9%，借债总额为3802210元，户均14623.9。从农户借债用途看，用于生产方面所占比例已占绝大部分，为85.07%，适用于非生产方面所占比例为14.93%。在生产性借债方面，用于农业生产所占的比例仅为12.80%，用于非农业生产所占的比例为72.27%。见表1、表2、表3。与前几次调查相比，第四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所反映出的农户借债用途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¹⁹

改革开放后，农户依然主要从私人借贷渠道获得借款。从各类调查看，农户的融资约束仍旧是抵押担保。

六、结语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1930年到1998年的近70年中，以保定地区为代表的华北农户借债用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其所反映出有农户融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说明农户随着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以及自身经济处境的不同，融资需求也有所不同。总体而言，70年中，保定地区农户借债用途变化趋势表现为由非生产性借债为主转向以生产性借债为主，这也表明，农户的融资需求变迁趋势是以生活性等借贷需求为主转向生产性借贷需求为主。

第二，农户借债用途结构的变迁，反映了农户自身经济环境的变迁。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小农多数穷困潦倒，艰难度日，常常需要借债来解决生活困难，处于“道义小农”的状态。新中国建立后，小农生活得到改善，入不敷出的农户数量逐渐减少，生活性借债所占比例下降，生产性借债所占比例上升，小农理性得到发挥，小农的“拐杖”日益结实粗壮，直至引导小农从传统小农向现代小农转型。

第三，传统小农融资的主渠道是民间私人借贷，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小农提供的融资服务远远不足，小农融资面临困境。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户在信用抵押担保方面存在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多谈。建立符合小农特点、满足小农融资需求的农村金融体系的突破点，应是大力发展各种信用抵押担保体系。

¹⁹ 1998年被调查农户借贷用途结构的重大变化，可能与1997年农村启动第二轮承包有关。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对清苑县2村200户农户收支情况的跟踪调查表明，保定地区农户借贷用途结构中，生活性借贷比例超过生产性借贷比例。不过，从总的趋势看，农户借贷用途结构中，生活性借贷比例逐渐变小，而生产性借贷比例逐渐变大。